

王纯五 译注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华道教典籍全译丛书

王纯五 译注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培德
封面设计 李向龙
技术设计 玉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全译

王纯五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104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 - 221 - 04782 - 0/B·113 定价:8.50 元

前 言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是一部记述中国道教宗教地理学的著名典籍。它作为道教的重要古籍，被收入《正统道藏》、《道藏精华录》、《道藏要籍选刊》、《丛书集成初编》等历代丛书中。后世学人在引述时简称此书为《名山洞天福地记》或《洞天福地记》。署名为“唐广成先生杜光庭编”。

(一)

杜光庭（公元850年~933年），字宾圣（见《宣和书谱》卷五、《书史会要》卷五、《郡斋读书志》卷二）。但《赤城志》卷第三十五写作“圣宾”。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四十七《前蜀十三·列传》中写作“宾至”。道号东瀛子（《十国春秋》写作“登瀛子”）。关于杜光庭的籍贯，历代记载不一。宋人《宣和书谱》卷五及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都写明是括苍人；宋人张唐英《蜀梼杌》卷上称他为长安人。宋人陈耆卿《赤城志》卷三十四说：或曰天台人，或曰括苍人。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又说：缙云人，一说长安人。查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说：“处州，今温州永嘉县是也。晋立为永嘉郡，梁、陈因之。隋开皇九年平陈，改永嘉为处州，十二年又改为括州（取括苍山为名）。天宝元年为缙云郡”。又在“缙云县”条下说：“万岁登封元年分丽水县东北界、婺州永康县南界置，因山为名。缙云山，一名仙都，黄帝炼丹于此”。清光绪年间所修《缙云县志》卷九对杜光庭的出生地有所考证，认为宋代《宣和书谱》说

杜光庭是处州括苍人即缙云人。其地今为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杜光庭于唐宣宗大中四年出生在缙云县仙都山，自幼即受仙道熏陶。但他少年时代所受教育却是传统的儒学。唐懿宗咸通年间，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去长安参加（儒学）九经科举考试，但未被录取。杜光庭回到浙江后，奋然入天台山学道，师事天台道士应夷节，为陶弘景七传弟子，成为道教上清派著名道士，奉行上清紫虚吞日月气诸法，自称天台华顶羽人。《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早先的自序末尾亦曾自署“华顶羽人杜光庭”。由于杜光庭曾经在天台山当了九年道士，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天台人。到了唐僖宗乾符初年（约875年左右），杜光庭又到长安，经官居翰林学士的好友郑畋推荐，得到唐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居上都太清宫为内供奉，出入禁中，成为“道门领袖”、“弘教大师”。后来，在杜光庭编撰的《历代帝王崇道记》一书所作自序末尾曾有“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光庭上进谨记”。文中的“上都”即唐朝的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新唐书》卷第三十七说：“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又据《旧唐书》卷九记载，唐玄宗天宝二年，“诏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由此可知，杜光庭受赐所居的上都太清宫，就是长安皇城原称“西京玄元庙”的道观，因唐高宗李治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而得名，在当时是唐朝京城道教中心。由于杜光庭曾几度居于长安，故后世又曾称他为长安人。杜光庭入道的上清派，亦称茅山宗，是唐代盛极一时的主流道派。陶弘景开创茅山宗时，即以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见解，以上清经为主，融汇三洞经法，吸收道、释、儒三教之长，采取开放态度；又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该派许多宗师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的甚至扮演了为帝王师的角色，李唐王朝本以道教为国教，再加上茅山宗唐代宗师，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

桢、李含光等人的努力，使该宗的法箓传遍全国，建立了长安、嵩山、青城山、王屋山、茅山、天台山等大的传教据点。到唐末五代，杜光庭成为著名的道教领袖，人称“扶宗立教，天下第一。”（见《道门通教必用集·杜天师传》）。

（二）

杜光庭一生中最辉煌的学术成就，是在他来到四川成都（唐时为剑南道四川节度使理所，称为成都府）以后的那段时间。关于杜光庭何时入蜀，以往研究道教史的学者多认为是“中和元年（881年）随僖宗入蜀”。^①王瑛先生在《杜光庭事迹考辨》一文中，根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二所载《青羊肆验》，自述他曾于丙午年到成都青肆访问陈评事，从而推断杜光庭首次入蜀，“当在876年春季至877年夏季之间。”^②由此可见，唐僖宗广明元年冬，黄巢占长安，杜光庭随同僖宗，经凤翔入川，于中和元年正月抵成都，应是他第二次入蜀。唐僖宗李僩为黄巢入京所震动，更加强了崇道活动，希望“玄穹降祐，圣祖垂祥，将歼大盗之兵戈，永耀中兴之事业”。将成都青羊肆玄中观赐号为青羊宫。中和元年七月，诏遣将仕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袁易简、赐紫道士杜光庭等，到青城山致祭，封丈人山为希夷公。继又在青城山中修灵宝道场、周天大醮，神灯千余，辉灼林表。杜光庭此时对青城洞天深为喜爱。他在为僖宗所写青词及祭山敕文中，赞美青城山“孕云雨于林峦，乃神仙之窟宅。丈人即天关紫府，镇于蜀郡青城，方象外之昆丘，状海边之蓬岛。”另一方面，他也深感“两都烟煤，六合榛棘；真宫道宇，所在凋零；云笈琅函，十无三二”。大唐王朝已如夕阳西下，作为国教的道教也日渐衰落，他决心以蜀中为据点，振兴道教。因此，光启元年（885年）初，僖宗从成都返回长安时，杜光庭即恳请辞去官职，留居青城山，专门从事道教的理论研究和教务活动。他有时也来成都，或

云游各道治，在成都时居住在城南玉局观；《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就是在玉局编写的。杜光庭约二十六、七岁入蜀到八十四岁去世，一直未离巴蜀。

公元 907 年，梁王朱全忠称帝于长安，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同年，前利州刺史、蜀王王建也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前蜀皇帝王建邀杜光庭出山辅政，曾说：“昔汉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命他为太子师、检校太傅太子宾客、谏议大夫，赐号广成先生。光庭推荐许寂（会稽人，少年时曾在浙江四明山为道士）、徐简夫以侍太子，曾共同议论朝政，注意“擢用才智，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便利前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后世称其政绩“前视刘备，可以无愧”（见宋张唐英《蜀梼杌》卷上）。王建对杜光庭特别尊重，下诏让杜光庭每遇起居朝贺，可单独直接与皇帝交谈，不与其它道众、僧人齐班，属于最高规格的礼遇。杜光庭为此写了《谢恩奉宣每遇朝贺不随二教独入引对表》（见《广成集》卷一）。光天二年（919 年），王建十一子王衍即位，乾德三年（921 年）八月，杜光庭为前蜀后主王衍受道篆于宣华苑中。王衍封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但杜光庭不居城中，仍结庐青城山白云溪畔。他晚年潜心修道，著述不辍。宋人陶谷《清异录》记杜光庭晚年的山居生活说：“广成先生手拄跻龙杖，红如腥肉，重若玉石，似非藤竹所为，行走于白云溪之间。”长兴二年（933 年）十一月，“一旦，披法服，作礼辞天，升堂趺坐而化。”（见《仙鉴》）。享年 84 岁，卒葬青城山清都观侧。

杜光庭对道教教义、宗教地理、斋醮科仪、修道方术、仙话传说等作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对唐末五代以前的道教作了初步总结，一生著作丰富，收入《道藏》的就有 20 余种。

(三)

杜光庭丰硕的学术成果，大体有六个方面：

一是对道教教理教义的研究，以《道德真经广圣义》为其代表作。此书作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共50卷。杜光庭在此以前注解诠释《老子道德经》的60余家，进行了分类的比较研究，并作出历史性的总结，把《道德经》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阶段，成为道教思想史上承先启后的巨著。杜光庭特别推崇唐玄宗“躬注八十一章，制疏六卷”，并借此突出具有思辩色彩的“重玄之道”。他在序言中说：“《道德真经》‘横亘古今，独立宇宙，虽诸家染翰，未穷众妙之门；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又说：“此经两卷，上经以道为目”，“夫其道也，极虚能之妙致，穷化济之神功，理贯生成，义该因果，纵之于己，则物我皆忘；荡之于怀，则有无双绝。道与德有相资相禀之义，故云《道德经》也。”从而点明“不滞有无，不执中道”的“都忘”为“重玄之道”的神髓。在道与德的关系上，杜光庭提出“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道是根本，德是结果。并从“本迹”、“理教”、“境智”、“人法”、“生成”、“有无”、“因果”七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杜光庭在极力神化老子，提出“大道之身即老君”的同时，又采取包容三教的开放态度，提出“修道即修心也，修心即修道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理者，现实虚无，以明善恶；导者，导执令忘，引凡人圣；通者，通生万法，变通无壅”。他在较高的层次上精辟分析了道家学说中理、导、通三者的关系，把即身成仙与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控制，加强道德修养相联系，提出“习道之士，灭心则契道；世俗之士，纵心则危身”，“以自然为体，道德为用。修之者，于国则无为无事，自致太平；于身则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驾景，久视长生。”杜光庭的上述研究，

对道教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是搜集整理散佚在各地的古代道教经典，得道经三千卷，编成《三洞藏》。他在《太上黄篆斋仪》中对历代《道藏》编篡史作了回顾性的总结，分析其得失。该书卷五十二说：“自三古以降，迄于巨唐，宝轴灵文，或隐或现，或出于史册，或著在别传。至宋朝简寂先生校讎之际，述《珠囊经目》万八千卷。其后江表干戈，秦中兵革，真经秘册，流散者多。”唐玄宗开元年间曾校刊道经，并著经目，杜光庭说：“玄宗著《琼纲经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但历经安史之乱和黄巢战火，道经多损毁散佚。杜光庭在《太上黄篆斋仪》卷五十二结尾处自述说：“近属巨寇凌犯，大驾南巡……余属兹艰会，漂寓成都，扈跸还京。淹留未几，再为搜寻。备涉艰难，新旧经诰三千卷，未获编次”。其后，他周游巴蜀，在川东丰都县得天师翟乾祐所传《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三卷，杜光庭特写序说：“余天复丙寅（906年）岁，请经于平都山，复得其本，编入《三洞藏》中，冀将来同好共知济物之志焉。”

三是对道教斋醮科仪及其音乐等的举理规范。斋醮是道教举行各种祭祷的宗教仪式。其法有清心洁身、筑坛设供、诵经上章、念咒化符、赞颂礼忏及道乐、禹步（舞蹈）、灯仪等。它是道教教义思想的形象体现，是道士遵守教规戒律和教徒坚定道德信仰的重要手段。杜光庭作为道教领袖，亲自主持了唐末五代的重大斋醮活动。对历代科仪进行归纳整理，他认为道教音乐能调和人们的心志，使人接近于道的境界，特别重视。杜光庭的道教科仪著作也很丰富，主要有：《金篆斋启坛仪》一卷，《金篆斋忏方仪》一卷，《太上黄篆斋仪》五十八卷，《太上灵宝玉匱明真斋忏方仪》一卷，《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清旦行道仪》一卷，《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一卷，《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阅篆斋仪》一卷，《洞神三皇七十二君斋方忏仪》一卷，《太上三洞传授道德经紫虚篆

拜表仪》一卷，《太上宣慈助化章》五卷等。尤以《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为其代表作。该书题署“广成先生杜光庭删定”，连同杜光庭的其它科仪著作共有二百卷被收入《正统道藏》，对后世影响很大。这段期间，他应帝王大臣及信徒的召请，亲自撰写了大量词章典雅的青词，今本《广成集》中即收有斋词 31 通，醮词 186 通。南宋道士吕太素在《道门通教必用集·杜天师传》称赞他说：“词林万叶，学海千寻，扶宗立教，海内一人”，“道门科教，自张天师，陆修静撰集以来，岁久荒坠。乃考真伪，条例始末，故天下羽褐，至今遵行。”

四是对有关道教的古代神话和仙话的整理，杜光庭创立老君创世神话。创世神话被神话学家们称为“构成一切神话的主题”。华夏先民的创世神话的基本观念，如造天地说、天圆地方说、大地漂浮说、天梯观念、不死药与仙乡说等，经过杜光庭的改造，提出“老君创世说”，为中国创世神话的一枝奇花。他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说：“老君生于无始，起于无因，为万道之先，元气之祖也”。“老君乃天地之根本，万物莫不由之而生成。故立乎不疾之途，游于无待之场，御空洞以升降，乘阴阳以陶埏，分布清浊，开辟乾坤，悬三光，育群品，天地得以分判，日月因之运行，四时行以代谢，五行得以相生。故于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亿万气之初，运玄元始三气而为天，上为三清三境，即始气为玉清境，元气为上清境，玄气为太清境”。“既分诸天，即以三十六天滓阴之气，下为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地皇，七十二君同禀命于老君矣。其诸天境域分布，凡有五亿之殊，皆三十六天之气所生也。地中有三十六洞天。”杜光庭还编写了记述 38 位著名女仙的《墉城集仙录》、写仙人王乔的《王氏神仙传》、记载善恶报应奇异仙话的《道教灵验记》和《神仙感遇传》。后者收录的《虬髯客传》等篇，是中国道教文学和传奇文学中为人喜爱的佳作，并被改编为戏剧。

五是对道教方术及科技的专著。杜光庭主张神仙是确实存在的，但修仙得道的途径却是多种多样的。他在《瑯城集仙录序》中说：“得道去世，或隐或显；证道虽一，修习或殊；故云神仙之道百数，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见《全唐文》第九百三十二卷）。他在《玄门枢要》中论及包括内丹、外丹、行气、咒鬼等诸多方术。他晚年在青城山建餐和阁，继续奉行上清紫虚吞日月气法。他还著有道教医理专书，名叫《玉函经》。并写有李冰修都江堰的《治水记》，因道教尊水为“三官大帝”之一，治水被视为度人济世的一大善功，李冰也被后世道教奉祀，称为“清源妙道真君”。唐末五代的道教的神仙思想，是出世与入世并重，注意对人们现实苦难的拯救，从杜光庭的宗教活动中亦可看出此点。

六是对道教方志和宗教地理学的著述，这是杜光庭留给后世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的代表作便是《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此书原有自序，曾署录：“天复辛酉八月四日癸未华顶羽人杜光庭于成都玉局编录”。“天复辛酉”即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当年八月杜光庭在成都玉局观（当时又叫“玉局化”，即天师道二十四治中的玉局治）编成此书。在此之前，他曾经云游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许多道教名山，作为全国的道门领袖，他又接触到各地道教宫观保存的经典和史志。此书编定距杜光庭首次入蜀已有15年，在此期间他对遍布巴蜀的天师道二十四治，多数作过实地采访，留下了许多方志、碑文和诗作，加上他入蜀前所写的，总合为洋洋大观的道教方志综录，其中最知名的有《青城山记》、《武夷山记》、《天坛王屋山圣迹记》、《修青城山诸观功德记》、《泸州刘真人碑记》、《三学山功德碑》、《云升宫广云外尊师碑记》、《青城县重修冲庙观碑记》、《题鹤鸣山》、《题平平盖治》、《题北平治》、《题本竹观》、《题鸿都官》、《题仙居观》等。这些都为杜光庭编撰《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四)

杜光庭用他渊博的学识，用他对道教教理教义的深刻理解，用他对道教的二十四治（化）、大、小洞天、福地及靖庐所作实地考察，对唐末五代以前的道教神学地理集作了系统地整理和订正，写出了一部划时代的宗教地理学大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中国的宗教地理学，其初始形态可以上溯至古代的《山海经》。“神话和地理的关系，在《山海经》一书中，见得更是密切。整部《山海经》，便可说是一部神话性质的地理书。”^④这部奇特的古书，大约是古代巫师世代相传的集体创作，它以原始宗教的神话为主干，加上山川海洋、著名特产、天文气象和奇风异俗等多学科的知识，浑然杂陈，宏伟瑰奇。中国古代的夏王朝和周王朝开始都兴起于中国西部，它们流传着“昆仑神话”，认为昆仑山是“百神之所在”，是主宰宇宙的天帝的下都。庄严巍峨的昆仑山，在《山海经》中的神圣地位，就如同众神之山的奥林匹斯山在希腊神话中的地位，那样崇高。古代居住在中国东方海边燕齐一带的人们，虽亦曾深受昆仑神话的影响，但由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更相信东方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里有不死之药，服食后便可长生不老。随着秦始皇、汉武帝先后派遣方士往东海寻求仙药，蓬莱神话也勃然兴起，产生出传为汉代东方朔所著的《十洲记》，所谓八方巨海之中有人迹罕到的十洲仙乡。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疑也在杜光庭所著的宗教地理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随着东汉时期黄老道、方仙道和太平道等早期道派的兴起；到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张陵天师正式创立道教以后，专述道教的宗教地理学也相继出现。此种道教地理学的早期表现为

《五岳真形图》。《正统道藏》中《洞玄部·灵图类》的《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大体上可称为具体五岳的平面示意图，它与后期产生的“五岳真形符”有别。《云笈七签》卷79载有托名东方朔的《五岳真形图序》，序文说：“五岳真形者，山水之象也。盘曲回转陵阜，形势高下参差，长短卷舒，”此种类似于现代地图等高线的五岳山川真形图（参见附图——《东岳真形图》），是为使道士“入经山林”时得百神保佑因而避免灾祸。这是在托言“神佑”的外衣下，传播着当时的宗教地理学知识。《汉武帝内传》一书记有道士云游四方，“瞻洱海之长短，察丘山之高卑”，为仙山作图写记。到了南北朝，开始出现记载道教地理学的道书。南朝梁武帝的儿子、武陵王肖纪，曾为益州刺史，他在蜀时的王府参军张辩（张陵十三世孙），于梁代天正壬申（公元552年）撰写成《天师治仪》。此书的全本已散佚，《正统道藏》于《受箓次第法信仪》中保存了该书的上卷，其中有对“道教二十四治”地理分布等的记述。北朝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在通道观道士严达、王延等人帮助下撰著道书，名为《无上秘要》，原书100卷，《唐书·艺文志》著录72卷，《正统道藏》收残本67卷，其中的《正一炁治品》，专记道教二十四治等宗教地理学的内容。初唐道士王悬河，别号陆海羽客，著有《三洞珠囊》一书，据学者考证，王悬河为唐高宗武后时人，曾于弘道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元684年1月15日）于成都建有《道教经序碑》两通，他所著书中引录唐初续成的《本际经》，新作的《海空经》和高宗时人尹文操所作的《老君圣纪》，称《庄子》为《南华论》，而不称经，且不避唐讳，可见《元上秘要》编写于武周在位时期，该书卷七为《二十四治品》，专记道教地理。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他少年学道，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篆，后遍游天下名山，隐居在浙江天台山玉霄

峰，自号“天台白云子”，曾数次奉诏入宫，成为道门领袖。他著有《天地宫府图》，记述道教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宗教地理。上述道教的宗教地理学著述，均为杜光庭以前的著作，自然成为杜氏撰写《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的主要借鉴。但杜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不仅系统整理和保存了历代记载，更提出自己与前人不同的学术见解。

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有如下几种与众不同的特色：

一是该书自序中，把“神话地理学”与“宗教地理学”加以区分。认为前者是“人迹所不及”；后者才是大地名山，神仙所到过的地方。

二是该书所记载的“三十六靖庐”的名称、地点，是目前唯一能见到这方面的资料，尤为珍贵。

三是该书所列道教地理，特别是七十二福地，明显地与司马承祯《天宫地府图》所记不同。杜氏将道教重要名山崆峒山、武当山、九华山、四明山、少室山、翠微山、临邛山、巫山、抱朴山、马迹山等18座名山列入，这些都是《天地宫府图》原记所无。与此同时，杜氏又将《天地宫府图》列入福地，但与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明显重复的绵竹山、北邙山、泸水等删去，使道教地理学具有较完整的内涵。对十大洞天的所在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也与《天地宫府图》有所不同。对第三西城山洞太玄总真天的地点，《天地宫府图》说：“未详所在，《登真隐诀》云：疑为终南太一山”。杜光庭则明指在蜀州（今四川崇州市）。对第四西玄山洞三元极真洞天，司马氏说：“恐非人迹所及，莫知其所在（按：后人曾据此推论在青海省西倾山）。杜光庭则明指：此洞为天“裴君所理，在金州（按：即今陕西省安康地区，后人认为是华山支脉）。

四是该书对道教二十四治的记述也自有特色。它取消了前人

关于“上品八治”、“中品八治”、“下品八治”的区分，也无别治、配治、游治之说；而与《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相同，有别于传统的三品等级观念。杜光庭所记的六十甲子生人分属二十四治中的一个治的资料，是现存唯一的记述，更觉珍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为后世保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可贵资料，且反映了杜光庭独特的学术见解，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该书也有它的不足处，因为杜光庭教务繁忙，著述太多，正如他在《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的自序中所说“事条繁广，不可备书，”所记较为简略，又均未说明选材的依据，使人难以查考。

我的这本《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全译》，其原文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道藏》第 11 册《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作底本。这个印本又是根据 1923 年至 1926 年上海涵芬楼借用北京白云观所藏明代正统年间所编《正统道藏》及万历年间所编《续道藏》的本子影印的。由于历代道书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各不相同，古今行政区划及地名变异很大，为使读者对道教地理学的主要方面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道教洞天福地的古今变迁及其丰富多采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特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和实地考察，在注释中较详细地加以说明。译文以直译为主，个别地方采用意译。使此书对中国道教的宗教地理学、道教史、道教考古学、古神话与道教仙话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对当今旅游业的开发提供史料，以资借鉴。一般读者也可浏览此书神游道教的洞天福地，得到无穷的乐趣。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注释和译文中难免有不妥或尚待深入研究的地方，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王纯五

1996 年 5 月 1 日

【注释】

- ①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第4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 ②见王瑛《杜光庭事迹考辨》，载于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
- ③见袁珂《山海经全译》前言第1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目 录

前 言	(1)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序	(1)
岳渎众山	(1)
海外五岳仙岛十洲	(6)
中国五岳	(17)
十大洞天	(28)
五镇海渎	(36)
三十六靖庐	(44)
三十六洞天	(53)
七十二福地	(67)
灵化二十四	(92)